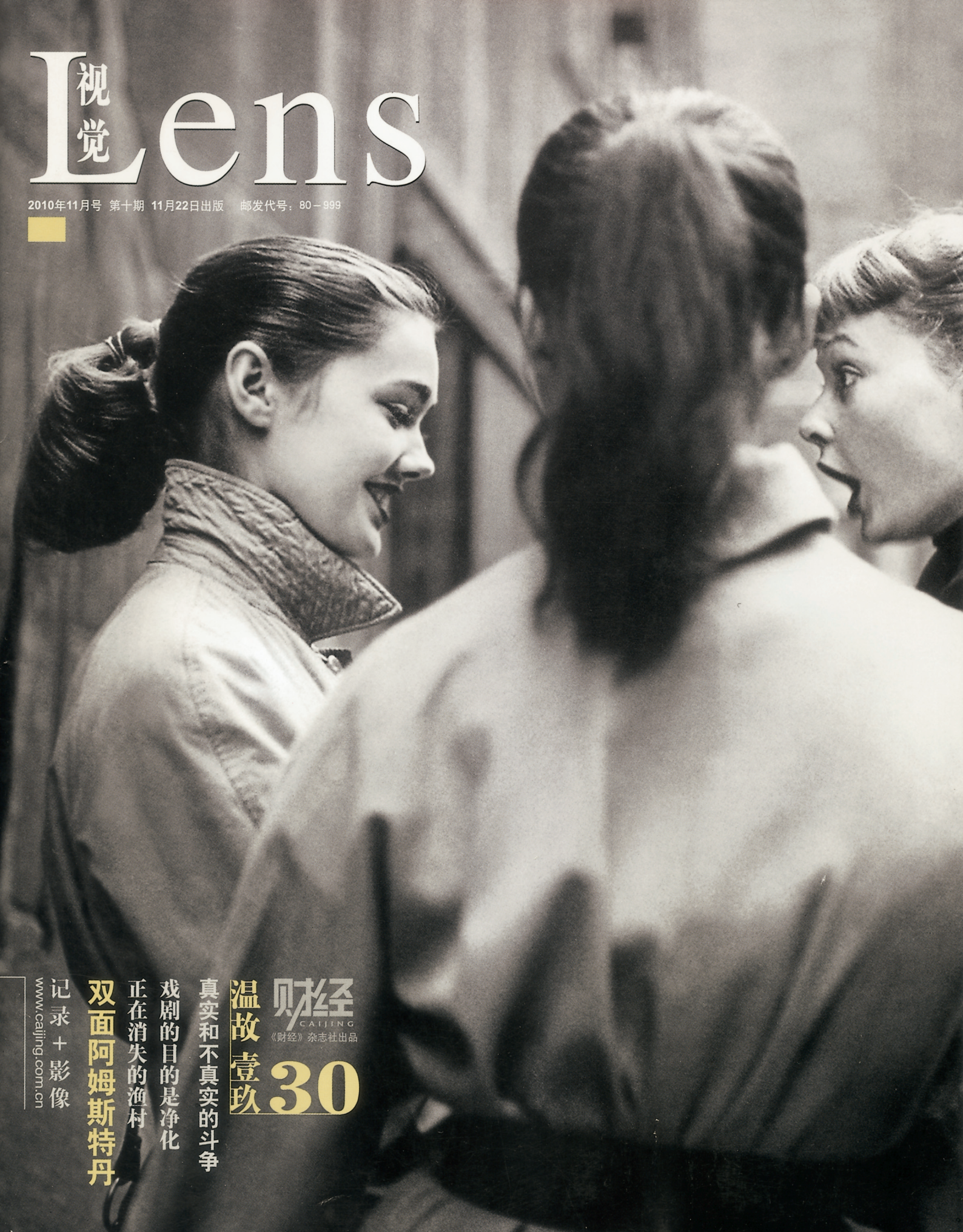


视觉 Lens

2010年11月号 第十期 11月22日出版 邮发代号：80-999



记录 + 影像
www.caijing.com.cn

双面阿姆斯特丹

正在消失的渔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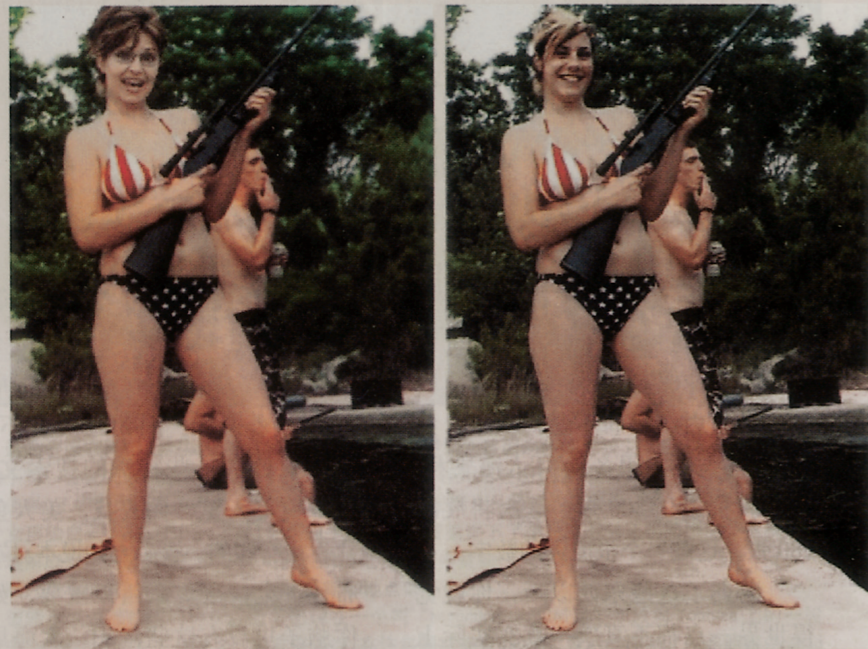
戏剧的目的是净化

真实和不真实的斗争

温故壹玖

财经
CAIJING
《财经》杂志社出品
30

2008: This photo of Governor Sarah Palin was widely distributed across the Internet shortly after Palin was announced as the vice presidential nominee for the Republican ticket. Shortly after its release the photo was revealed to be a composite of Palin's head and somebody else's body.



2008年美国大选中，有人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帕林（Sarah Palin）（右下图）的头像替换在一位持枪模特身上。这张伪造的照片让一些选民相信帕林有暴力倾向。

帕林曾经是阿拉斯加选美小姐的季军，五个孩子的母亲。当她抱着五个月大、正在哺乳期的孩子出现在电视中，这位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给民众带去了一股既不同于传统女性也不同于女权主义者的健康形象。无论哪一党的支持者，都不能轻易否认这种形象的亲和力。但她的政治主张带有典型的“保守性”，包括反对堕胎、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个人持枪权（她和丈夫都热衷户外运动，打猎捕鱼不在话下，而不用像希拉里一样宣称“我真的打过鸭子”），在州内强力反腐败。

在这种宣传策略下被推出持枪照片，无疑令帕林的形象大打折扣。媒体也猜测幕后黑手是民主党。



真实和不真实的斗争

文 / 本刊记者 张策

因为资金问题，两个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拆迁决定被暂时搁浅，北京黑桥艺术区未被拆除，艺术家张大力1500平方米的工作室得以留存。

黑桥村比位于城乡接合带上的草场地艺术区更偏远。从三元桥一直向东向北，穿越大山子桥后进入机场辅路，再从附近惟一明显的标志性建筑物——孤零零耸立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向北穿越一小片垃圾地、一段乡村土路，以及一片低矮的平房，才能到达。

秋末冬初，道路两旁稀少的树枝早就脱落了叶子。因为远离城市，黑桥村上空天色湛蓝，有一小群漆黑的乌鸦和被寒风吹起的白色垃圾袋，一起在空中飞来飞去。

11月7日下午，我第二次拜访张大力。上一次是在一年前的12月，比现在更加寒冷。

他的工作室在F区，黑色的大铁门、赭石色的高墙把他拥有的空间很好地保护起来。两年前张大力来到这里的时候，用50万元人民币装修了这个院子。一卡车的漆将地面涂抹得油光可鉴，全部采用德国进口门窗，目标是不让外面的一粒尘土飘进来。

院内有一片小花园，地上的草在这个季节居然还是嫩绿的，花园里还有精致的雕塑。打开院内另一扇大铁门进入的是一个巨大的展厅，这里摆放着他的新作品。他很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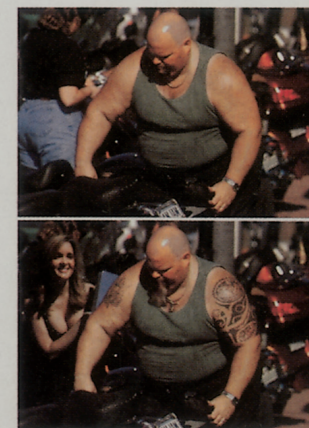
地给我看他用蓝赛技术拍摄的照片。据说这是早期摄影术，把调配好的化学原料涂在画布上，摆在阳光下，三分钟后，这张画布就把它前方物体的影子按照比例记录下来。

张大力和他的工人骑自行车上，记录下自己双脚离地的影子；他还一个人跑到昌平的深山里，用同样的方法拍摄了辽代的古塔——那些塔耸立在荒草丛中，无人问津。张大力相信，他的记录对将来研究那些古塔的人会有帮助。

最后一道铁门里的空间被楼梯隔成两部分，楼上是他办公的地方，格局像学校的图书馆。每一份资料都贴着标签，用资料夹整理，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资料和书很多，占据的书架已近十米。他没有助理，每一项工作都由自己完成。

22年前，导演吴文光记录圆明园流浪画家的纪录片《流浪北京》中，长发的张大力对着镜头说：“我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能稳定地生活，没有人赶我离开。”那时张大力25岁，五年前他经过三次高考从东北小城鸡西考入中央工艺美院。当时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告诉他们，“你们别幻想，我们培养实用人才，不培养艺术家。”

毕业后因为不服从学校分配，张大力丢了档案，在北京漂泊。漂泊期间，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这位意大利姑娘小时候看了一部马来西亚电影，错把片中英雄的国籍记



这是多克·鲍曼（Doc Baumann）的一组获得“真假”奖的照片。一个在生活中平淡无奇的肥胖男人，围绕在他身边来去的也不过是同样平常的女人，但经过PS之后，他有了性感的金色胡子、项链和文身，那被视为是一种雄性魅力的展现，而环伺身边的也变成了身材劲爆的年轻女孩。这也是大众媒体一直渲染的那种充满欲望与活力的人生。鲍曼想以此提醒，形象在传播中的重要性。

从2009年起，“真假”奖对参赛作品有两层评判：一是看创作者能否就形象设计提出一种有意义的想法；二是修饰的技术是否完美到连专业人士也难以察觉。



伴随这幅照片流传的还有一段“科普”：据说一头蓝鲸每次射出的400加仑精液（1加仑约等于3.78升），只有40加仑进入母鲸体内，余下全溶在海水里，所以海水很咸。假如这个论断属实，那么据推断，这个可怜的生物将不得不带着一个大于其身体的睾丸，才能装得下那么多的精液。而且，蓝鲸长75英尺，从图片中人与蓝鲸的大小比例来看，这头生物显然比蓝鲸小，它更像是鲸鲨——而鲸鲨是没有阴茎的。图片显然被修改过了。

其实这是2002年底的一个邮件玩笑，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直到2003年中才被较真的人搞清楚。

张大力 Zhang 2010.10



▲ 这是一张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的照片，因为这个伊朗女孩面对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所摆出的手势，会让人联想起其他国家一些历史事件中，年轻人站在坦克面前的行为。

但是，正如意大利主流报纸《晚邮报》所评论的，这张图片是影像的蒙太奇，它的意味带有模糊性：这个女孩独自一人站在车前，伸出细长的手腕，而内贾德停下了车，脸上甚至带着微笑，你既可以把它理解成女孩在孤独地抵抗，也可以理解成她在欢迎内贾德。

照片最早被张贴在 twitter 上，拍摄日期和地点都不详。

被修改成竖起中指的照片，最早出现在一个叫“secondprotocollo”的 ID 放到 Youtube 上的一段录像中，secondprotocollo 是意大利非政府组织，在许多国家都有办公室，背后的控制人叫弗朗哥 (Franco Londei)，这是一个出了名的极端组织，经常发布一些捏造的针对中东地区 / 国家的假新闻。

另外，也有网友从人体结构的角度，论证了在手臂保持图中姿势的情况下，手腕不可能完成竖中指的动作。



▲ 北极，一轮残缺的月亮悬在落日的上空。让人惊异，而且很迷人。但它不是真的，而是2008年天文学学生尹格·尼勒森用一款电脑软件创作的。尽管人们从天文学和摄影的角度，能轻易论证它并非真实。但它在互联网上传播了两年，并且始终被当做真实的自然景观。“有人把我的名字删除，把图片命名为‘北极的日落’，然后到处告诉别人它是一张摄影照片。”尹格·尼勒森说。



▲ 2005年3月的一期《新闻周刊》封面上，玛莎·斯图尔特的头被粘贴在了一个模特的身体上。尽管在该期杂志的第三页，特别注明了玛莎的头部为马克·布莱恩-布朗所摄，但这也不能让《新闻周刊》免受批评。

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家协会 (NPPA) 认为那不是一次公开的声明，因为“通常情况下，读者并不知道照片中的身体不是玛莎的。而且公众总是不信任媒体，这无疑给他们留下了口实”。NPPA 宣称，这次《新闻周刊》的封面是“一个巨大的道德裂口”。

该照片的背景是玛莎出狱——这个曾跻身“全美第二大女富豪”的女强人，因为涉及一笔非法股票交易，锒铛入狱五个月。但是她在监狱中照样过得很风光，不但帮忙改善囚犯的伙食，还在外界保持着极高的曝光率，旗下公司的股价也是居高不下。人人都想看她出狱后怎样再铸辉煌，连《新闻周刊》也说蹲监狱让她“更瘦了、更富了”，但他们对她的身材显然并不太满意。

玛莎的原照片拍摄于文章发表的九个月前，当时她在出席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的颁奖典礼。照片实际出自资深狗仔罗恩·格莱拉之手。

▲ 2010年9月14日，埃及最大的报纸《金字塔报》(Al-Ahram) 发表了将穆巴拉克调换位置的假照片：原始照片中，奥巴马在前，引领着参加中东和平谈判的领导人——约旦国王阿普杜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但在发表的照片中，穆巴拉克从最后一个被挪到了最前面。9月17日该报主编对美联社辩称，“这种修改是为了简明、生动、真实地反映穆巴拉克总统的领导地位。”

《金字塔报》是埃及的国营报纸，记者无国界等组织一直指责这个在政治和经济上均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缺乏新闻自由，政府拥有99%的报刊亭的控制权。

专题 Special Topic

成了中国，于是就来了。

1989年，圆明园待不下去了，他跟着妻子前往欧洲。1995年他带着妻女回国，把两个女儿送进胡同里办的托儿所，自己开了家小型的灯箱装帧公司，白天加工灯箱，夜里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涂大人头，那是他回国后第一组创作——《对话》。

他的人头也涂在了李景汉家的四合院墙上。李景汉不知道他是谁，但决定一定要找到他并要为他办一次展览。2000年，他的作品成为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他成名了。

47岁的张大力现在还是东北口音，他夜里看书，上午睡觉，下午工作。他习惯了意大利实心面条的硬度，午饭永远是意大利面条。

他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在看龙应台，兴奋得早上五点才睡着，之前令他兴奋的是北岛的《城门开》。他没有博客，没有微博，他对物理、化学读物，还有其他一些在一般艺术家看来稀奇古怪的东西有着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影响到了他的女儿——她已经被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MIT) 录取，专业是物理学。

张大力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化比对照片真伪的人，他的研究从今年9月起延伸至国外，并于本月完成了最新创作的《视觉机器》(Visual Machine)。《视觉机器》明年将在法国展出。

“我们实际上什么也相信不了” / 《LENS.视觉》：这批图片你从哪儿找到的？

张大力：挺复杂的，主要是在

各种网站里找，各种文字的，我找了十几个外国朋友帮我。我是用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六种语言文字做的这个作品。互联网实际上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用得好什么都能找得到。

《LENS.视觉》：为什么会想做一个国际上的呢？

张大力：艺术家一生都在剥竹笋，剥一层二层三层可能觉得结束了，但实际上他没有找到真正的金子，所以要一直研究下去。

《LENS.视觉》：你做了多久？

张大力：时间不长，从9月份开始。参与的人很多，运用人海战术。最后我精选了300张，这次将展出280张。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调查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就觉得世界一点都不真实，真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实际上什么也相信不了。

《LENS.视觉》：那张最原始的照片，你如何找到的？

张大力：假照片是这样的，可能在好几个网站上都有，而且形式不一样，可能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拷贝了，有时在西班牙网站上有，在英国网站也有，但是经过好几手以后，已经不清楚了。第一个是不清楚，第二个是文字发生了变化。我要用各种文字证明它，这张照片到底是什么。

《LENS.视觉》：怎么去识别图片是真的？

张大力：通过别的网站去找，我知道他们修改在哪儿。不管左派

右派，大家都在互相用这种东西来攻击对方，所以图片已经变成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图片，它跟真实事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当我们看到一张图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在说什么，往往通过图片底下的文字来看它是什么，文字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文字也在造假。

《LENS.视觉》：这需要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流程。

张大力：对，只要你组织能力好，如果组织能力不好，就做不好这个事情。要分很多小组，然后每个人怎么去查，因为查的人不懂，我会给他们一些特殊的搜索文字。比如说美人鱼，你去找，美人鱼照片肯定有假的。然后比如说本·拉登、布什、鬼，这些东西很重要，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这些意识，大海里捞针，肯定找不到。

《LENS.视觉》：就是你说提供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你想到的肯定会作假的主题。

张大力：对。在我脑子里已经知道了。比如说UFO，比如说外星人，有时候看到这些照片我都傻笑。

《LENS.视觉》：大概有多少人帮助你做这些事情？

张大力：十几个。在北京的，懂法文的、英文的、意大利文的、葡萄牙文的、西班牙文的、德文的外国人。因为最后深入他们地方网站的时候，必须懂那种文字。包括新纳粹的网站我都上，我看他们登过去犹太大屠杀的照片，他们改完了登在网站上，说原来那张照片是



2006年7月30日，路透社拍摄了一组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村庄加纳村后惨状的照片，却被许多网友质疑，理由是有一名神秘的、戴眼镜和绿色头盔的“救援人员”，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总是与一具小孩的尸体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在“游行”。一个博客搜集了当天有关他的所有照片，其实每一张照片分开看时都没有问题，但当你把当天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的照片全部浏览一遍之后就会发现他很明显是在作秀。他总和那几具尸体在一起，却没有抓紧时间进行救援。

网友戏称这个男人可能是一名“真主党场景设计师”，或者某个媒体公关公司的头儿，想要最大限度榨取宣传效果。

当年，还有几起与此背景类似的照片作假事件，它们共同的目的，都是服务于真主党的宣传，以使以色列的袭击看起来尽可能地残酷。



2007年9月，刚刚当选为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的詹姆斯·帕内尔，尽管告诫媒体不要编造材料，但他却用假照片让自己充当了丑闻的主角。

在上图中，他出现在参观医院的部长们中间。真相是那天他迟到了，所以不得不单独留影（右图），事后再与其他的部长合在一起（上图左）。不过帕内尔辩称照片原来就是要分开拍的，但该照片的摄影师马特推翻了帕内尔的说辞，并且说PS的照片不止这一张。

另外，照片公布之前的一个月，一个医院的领导发了一封邮件给帕内尔：“我很高兴，我们找到的一个摄影师可以把你放在照片里。”帕内尔宣称他没有看过这封邮件。但在照片发表的几天前，一封含有照片的邮件同样发到帕内尔的收件箱。

但帕内尔在2008年1月仍然得到了晋升，直到2009年因为议员费用丑闻而辞职。



在一家旅行社给英国（左图）和美国（右图）的度假宣传照片中，模特们变换了自己的位置和装束。发给英国游客的版本里多了一些鲜花的点缀，它让人联想起这个国家对殖民地风情的迷恋，但最富争议的是，美国版里出现的黑人和其女友消失了。有评论认为，它显示了英国在种族问题上的保守性。

一个叫“WestEndGirl”的网友就评论说：“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的体会是，所有其他国家的‘少数派’电影，特别是专门讲某一个不同宗教、种族的电影总会被排到艺术类电影中去。民众通常只喜欢看不用动脑子的电影。”

但比这种具体的争端更值得重视的是：商业公司任意掌控宣传画中少数人种的出现或消失，这无异于表示公司只是从战略意义上考虑何种公共面孔应该出现在自己的广告上，而没有考虑过其中的道德意义。这种做法回避了多元化的参与，也许是因为“多元化”本身就是一个雷区。光是对“多元化”下定义已经非常困难，更别说要去把它构建起来，或者要去管理它了。不过，这些困难是人们必须面对的。否则，所有这些战略行为，无论是向着少数人种还是背离少数人种的，它们的动机都是危险的。



左图是2010年，马来西亚政客王素恩用于证明自己曾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勋的照片。这张照片篡改自罗斯·布朗受勋的照片（右图）。

英国皇室的发言人称，他们未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王素恩授予任何荣誉。



2010年9月18日晚上，作家和插画家格雷格在BBC网站上看到了著名演员（也是公开同性恋者）伊恩·迈凯伦（Ian McKellen）参加反对教皇游行的照片。照片上迈凯伦穿着写有“看开点吧，有些人是同性恋”标语的T恤。格雷格马上想到，如果把标语改成“看开点吧，我是甘道夫和万磁王”会更有意思。于是他马上改了并发了微博。后在转发中被拥有50万粉丝的著名演员西蒙·佩吉（Simon Pegg）转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修改的照片登上twitter热门图片首页。很快，格雷格就在微博上澄清说图片并不是真的，并解释实情，但是显然在像病毒般转发的假图片面前，文字解释是那么苍白无力，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得知了真相。

其实，若是真假两张图放在一起，还是有迹可循的。第一，修改过的图片中T恤上标语的字体不统一，而原图上是统一的；第二，原图中迈凯伦身后的人身上写着同样的标语。但是这张图还是疯狂地欺骗了很多人，格雷格是始作俑者这件事也很快被人遗忘了。

专题 Special Topic



2010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悬赏捉拿本·拉登”的网站上说，鉴于已有两年多时间没获得含有本·拉登容貌的新照片或录像，FBI利用“尖端技术”结合年龄等因素制成本·拉登“近照”（右图）并予以公布，以便今后执行抓捕、打击任务时能更加准确识别这名恐怖头目。赏金高达2500万美元。

1月16日，西班牙议员利亚马·萨雷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这组“近照”中，其中一张本·拉登的发型、脸型 and 额头完全是从自己过去一张竞选活动照片（左图）上拷贝而来，几乎未做任何改动，甚至连每根头发卷曲程度都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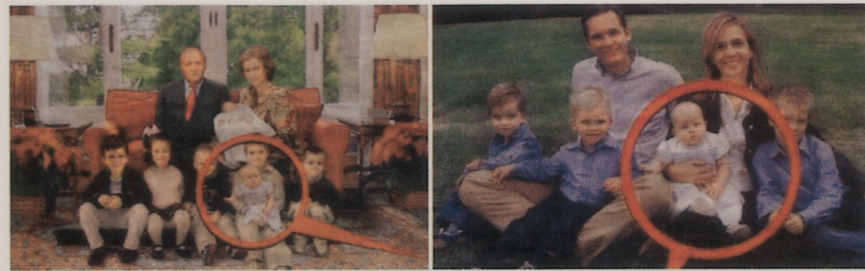
53岁的萨雷斯是西班牙左翼联盟党成员，2000年首次当选议员。他说，自己被FBI用他的照片合成恐怖分子照片的做法惊呆了，“它影响了我的荣誉、我的形象和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因为FBI可能拿其他人的照片去PS）。”

FBI的发言人随后承认：法医艺术家无法从FBI的照片数据库内找到相匹配的特征，于是转而求助于互联网，从图片搜索中找到一幅满足要求的照片。艺术家本人并不知道照片主人的身份，FBI会收回这张已流传甚广的本·拉登“近照”。

2010年，美联社报道了一条新闻，说共和党的行政人员埃尔顿·奥瑟曼（Eldon Orthmann）用一张奥巴马吸烟的小黑白照替换了原本在法院大楼会议室中的小布什的照片。但美联社全文并没有提到奥巴马叼着香烟的照片是一张假照片。

其实，这张假照片在2008年初就被曝光，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奥巴马+吸烟+照片”几个关键词，就会马上看见这张篡改的照片和其他一些奥巴马吸烟的假照片。“恶作剧博物馆”网站表示，这张照片其实是2004年8月3日卡瓦米·罗斯（Kwame Ross）拍的。当时奥巴马还是一名州参议员，他正在为竞选美国参议员而在伊利诺斯大学会见选民。后来照片被匿名者用数码技术加上了一根香烟。

不过，会有人对这张假照片感兴趣，因为奥巴马曾经承诺，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远离香烟，但反烟人士希望总统也能做出表率。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在烟草引起的疾病的医疗保健上要花费约960亿美元。



左图是西班牙国王、王后及其七个孙子、孙女，在圣诞节那天拍的一张合影，以向国民传递家庭的温馨。

照片发表后被《世界报》发现了破绽。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照片中七个月大的艾琳被她的兄长胡安抱着，但她同样的姿势出现在更早的一张照片（右图）里：当时，她与父母待在一个花园里，抱着她的是她的母亲。

国王夫妇是“想要与七个孩子一起传递新年的愿望，因此决定创造一幅合成照片”。皇室的一个发言人表示，而在那一天恰好无法把国王夫妇与七个孩子弄到一起。



画廊,理性健全了以后,压力就大了,要有责任、有目标、有方向。

《LENS.视觉》:婚后你就去了欧洲?

张大力:我1989年7月30日走的。本来我没有想过要出国,这辈子都没有想过。但圆明园不让住了,我老婆本来兼职做一些工作,公司关闭她就失业了,我们没有地方去,回了一趟东北,当时从北京来的人都要审查。我们想还是去意大利吧,她父母在那儿。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先坐飞机到了香港,然后从香港去意大利。之前我们没有钱,连机票都买不起。在北京我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后来创办了国内第一份英文杂志,他买了我几张画,800美元,正好是我去欧洲的机票。我拎了两个行李,里面全是我的画,连衣服都没有。到了香港下飞机以后,非常震惊,那个机场那么大,那么漂亮,人穿的都那么好,我看着我自己怎么那么寒酸。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当然,去欧洲对我人生太重要了,我在那儿改变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因为我看到了别的民族和别的文化怎么生存,他们怎么去跟他们的体制来做斗争,他们的政治情况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艺术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历练,我今天也不会变成这样的人。

“我的孩子在胡同里长大” /

《LENS.视觉》:刚到欧洲,你是无

名的。

张大力:是,我连外语都不会,从零做起,开始学第一个词。主要靠我妻子,她教汉语,勉强维持生存。

《LENS.视觉》:你们是回到了她的家乡?

张大力:对,波罗西亚。这样她父母可以帮帮我们,我们除了房租,还要付水电费,就没了。吃的很简单,天天吃面条,吃了20年面条,现在还在吃。那是一个大学城,学生占了很大部分,是意大利北方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文化很活跃,画廊也很多。

《LENS.视觉》:为什么又选择回来定居呢?

张大力:我是1995年8月回北京定居的。1993年我回来过一次,到深圳。正好是南方剧变的开始,看到有酒吧了,还有歌厅、大楼,很多人能租房子,自由地生活,给我影响特别大。我想我应该回到中国,因为对中国的变化我不能当一个旁观者,我必须参与进去。我当时做的决定是一个感性的决定,但是对的。

《LENS.视觉》:那个时候你在意大利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张大力:家庭和生活都已经稳定,能卖一点画,在德国等地有一些小的展览。可是我到欧洲不是为了生活,是被迫去的,我不能当一个华侨在那儿改变我的身份。我的艺术应该是为了改变中国而做的,我是这个文化里的人。

《LENS.视觉》:你在欧洲没有

归属感?

张大力:没有,肯定没有。我的文化还和当地的文化发生冲突,虽然我学了很多他们的文化,但是那个文化不是我与生俱来的,我没有那种热情和快乐。我觉得一个人从他开始有自觉身份,一直到20多岁是身份定型、文化定型的时期。如果你把孩子三五岁送出去,送到英国,长到20岁,他会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虽然他长着黄色的脸。文化认同非常重要,世界上的人长得各式各样,但是你能认为你是什么人,实际上是你的文化说了算,而不是你拿了什么证件。

《LENS.视觉》:当时你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不如在欧洲?

张大力:挺窘迫的,能温饱,但没有多少资金投入创作。回中国以后,发现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的同学朋友都有很大的公司,买了很好的车,我只是一个普通艺术家。我还记得聚会的时候,一个朋友说,“你们穷艺术家”。

《LENS.视觉》:你夫人为什么同意你的选择?

张大力:我必须得回中国,如果她不跟我回来,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是我的国家,我的艺术要在这儿发生变化,我不能看到这个国家的变化我不参与。还有,我的两个小孩,大的已经四岁,小的一岁,开始学说话,我发现我和大女儿说中文,她听得懂,但是她回答是用意大利语,这对我刺激特别大。我的孩子跟我说外语,那是不行的。我得把她俩拎回中国来,让她们学中文。

假的,现在这张是真的。

《LENS.视觉》:你认为影像造假的动机主要是什么?

张大力:各式各样的动机,商业的、攻击对方的、政治的、抢新闻的,能总结的太多了。

我最后已经不关注动机了。摄影到今天已经是150年,150年的摄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重要的记录,可它毕竟是一个人类创造的玩意,它的语义后来发生了变化,可能承载了一种它自己本身不能承载的东西。

我参加展览的280张照片,有一大半是从2000年开始作假的。说明了什么?从2000年以后,我们开始有电脑,有Photoshop,这个工具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作假的可能性。

现在摄影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开始研究视觉的机制,或者视觉的影像机制。我在研究影像史,实际上也是在研究世界史,我们人类到今天,一直都是真实和不真实在斗争。

《LENS.视觉》:你认为世界不可靠?

张大力:不可靠。所以我现在不用什么人,我就用我自己的脑子,我也不用别人说的那些人云亦云。前天晚上我看北岛的书,就特别有感触。他跟他爸爸聊天,他爸曾在谢冰心手下工作,但他爸爸一度“有特殊使命,‘监视’谢冰心,设法套出心里话”。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当你看到你的档案里那么多朋友来揭发告状,写你不好的时候,都是跟你最近的人,你会怎么样,你死的

心都会有,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可靠,没有人能够放心依靠,没有温情。

《LENS.视觉》:你会不会因此不安?

张大力:我有办法对付。当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如果没有办法对付,我会疯了。当知道一个事情不可靠的时候,你肯定得有办法去对付,才会不发狂。不可靠的事情你尽量把它变得可靠,就是把被动变成主动。中国是一个没有仁义的国家,连亲情都靠不住。我们还是依靠自己。

“我是被迫离开的” /

《LENS.视觉》:你艺术生活的起点是从圆明园开始的吗?

张大力:更早,是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我那时候受“八五新潮”的影响,开始创作一些作品,那些作品都跟那个时代有关,开始有哲学上的冲击。那个时候流行禅宗、佛教的东西,存在主义,还有弗洛伊德。

《LENS.视觉》:大二那年你决定将来做什么?

张大力:做艺术家,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艺术家。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我知道我要做一个艺术家,要离开那个小的城市(黑龙江省鸡西市——编注)。我把中国的美术学院都考遍了,我从1980年开始考学,一直到1983年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艺术系,就是书籍装帧。那个时代改变身份,只有通过

大学。

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就是想脱离家庭,走得越远越好,还有脱离那个小城市,想当个艺术家到首都来。

不过我们设计学院的校长告诉我们,你们别幻想,我们培养的是实用人才,不是什么艺术家。毕业后,给我分到了东北佳木斯的一个草编厂。我没有服从分配,就留在北京,去了圆明园。

当时我们选择圆明园,第一因为它离北大很近,我们刚刚脱离大学,不知道去哪儿。其次,那里可以租房子,当时还没有市场经济,那个地方很多农民盖小房子出租,房价便宜。第三,可以到北大去听讲座,那个时候北大非常开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北大吃饭,差不多一毛钱可以买一两个菜。那时候我们都是从圆明园骑车到北大吃饭,听讲座,跟学生混,在北大的学生宿舍住。

《LENS.视觉》:你在北大认识了现在的夫人?

张大力:对,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牟森,排话剧的,也流落到圆明园,跟我住一个房间。因为我们都没有钱,我帮他排话剧,做舞台布景,他招了各式各样的人,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去看这个演出,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她父母也是工人。

过了这么多年回想,在圆明园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间。没有工作,也不用负责任。那个时候没有艺术市场,不必为了市场来创作,完全由着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等你慢慢成熟了,有家庭、市场、



▲ 在今年纽约举行的一次展览上，这张照片引起震动。照片显示1931年一个雪茄似的圆状物向纽约帝国大厦靠近，随后停在了上面。那雪茄就是洛杉矶号飞船。

帝国大厦现有的高度是大萧条时期华尔街富豪竞赛的结果。当时克莱斯勒大厦高1046英尺，因此帝国大厦的投资人并不满足盖一座只有1050英尺的摩天大厦，于是建筑师又在帝国大厦上加了一座200英尺高的圆塔。该圆塔宣称将成为纽约市中心的飞船停泊站，一艘800英尺长的飞船可以停在大厦上，“于微风中摇摆”，乘客这时就能落下来，7分钟后可自由走在街上。

一些富有经验的飞船船长当时认为这一想法不切实际，也会冒很大危险。因为飞船的着陆需要很多地面人员，船头、船尾都需要缆索。随后一些飞船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均告失败。洛杉矶号飞船在1931年11月的确从帝国大厦上飞过，但时间是晚上10点。



▲ 1939年，英王乔治六世及伊丽莎白女皇和加拿大总理麦肯斯在阿尔伯特塔省班菲镇相谈甚欢。但是，在麦肯斯竞选连任的时候，可怜的乔治六世在照片上被抹去了。

没有人能确定麦肯斯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不过人们倒是几种猜测：是想在竞选宣传中告诉人们，自己很值得信任，连英王都放心他跟自己的妻子单独在一起？还是他相信自己成为图片中惟一的“王”？不过专家们认为最权威的分析是：自尊心极强的麦肯斯认为，在没有英王的情况下，这张照片可以体现出他强大的个人魅力——女皇面带崇敬地看着他——他控制着整个局面。

被修改过的老照片仍然拥有巨大的历史价值，这在于它的假恰恰告诉了我们，过去的人们孜孜不倦地在追求着什么。



▲ 在Youtube上一个名为《Faces of the No》的视频中，在提及爱尔兰社会党时，视频中配了这张托洛茨基的照片，描绘了这个苏共领导人和红军士兵正在侮辱这两个女人。但这是一张假照片，真实的照片中托洛茨基只是在向部下挥动起他那富有激情的手而已。照片可能是当时西方还普遍反对共产主义时就被篡改的。

视频发布的背景则是爱尔兰国内围绕是否要批准《里斯本条约》、加入欧洲讨论和投票。多数国民都倾向于依附欧洲，而社会党是主要的反对力量，因此受到许多批评。欧洲多个国家的社会党被认为与托洛茨基的思想有一定关系。

她们一直在这儿读到高中毕业考大学，中国大学也考了，但选择了去国外。很多家长着急把孩子送到国外，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他们会发现孩子的文化跟他的文化是不相容的。

北京第一个拥有画册的艺术家 / 《LENS视觉》：你1995年回国之后不久就成名了吧？

张大力：因为我开始在街上涂鸦。这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当时中国没有涂鸦，而且正在拆迁，拆完了，房盖被挑了以后，白墙像尸体，房屋的尸体，我的黑色墨线涂上去，大家很惊诧，很震惊。大部分人对我的艺术反感，他们认为这不是艺术，认为艺术不能拿到公共空间来。

《LENS视觉》：那你从做灯箱到成名，这中间是怎样过渡的？

张大力：我那时候在做灯箱，生意也不太好，所以我把我的很多作品也做成灯箱。到了1998年，北京有一个画廊，在东华门，叫四合院画廊，那是李景汉做的。我当时在北京到处画人头，一个人头画到他家门前了，他每次出门就看，他派底下的一个美国人找到我。当然我的胆子也比较大，我说你给我出一本画册，他说可以啊。我是在北京第一个拥有画册的艺术家。

《LENS视觉》：那个时候艺术家还不流行做这个吧？

张大力：不流行，没有人想到会这么做。他说你去设计一下，我越设计越厚，打样给他看的时候，



▲ 照片是多萝西娅·兰格在1936年美国加州大萧条时期所拍。

一张是关于一个贫苦的戴眼镜女人和她的孩子（下图），她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依靠，除了身上的衣服、脏破的车子和彼此的存在。兰格提供的文字解释道：“这辆车子停在职业介绍所的外头，他们一家人在马铃薯收获之前，就已经到了。他们在路上漂泊了一个月，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为了拍照，孩子的父亲把毛毯边沾湿，给孩子擦脸。”

而另外一张，记录32岁的豌豆采摘工、七个孩子的母亲弗洛伦丝·欧文斯·汤普森，和她的孩子坐在帐篷周围。她的丈夫死于肺结核，当时她滞留在加州尼波莫的一个迁徙劳工农场。她的家庭靠孩子们打的鸟和从附近一片野地里挖的菜糊口度日——和那里其他2500名收入微薄的工人一样。照片以“迁徙中的母亲”为题发表，对后来美国的福利政策有很大影响。

这些照片意在强调大萧条带给人们的痛苦和贫困，虽然人们生活实际与此相差不是太远，但与那个时候的很多同类照片一样，它们是为了支持罗斯福政府，而被特别制造出来的。当时还是实习摄影师的兰格，也是受到了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FSA）的委托。

事实上，在拍摄戴眼镜女子那张照片的同一天，兰格还拍摄了其他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们笑逐颜开，孩子的脸也洗得很干净（上图）。



▲ 这是反战运动的一张标志性图片——1970年5月4日，四名反战学生被政府枪杀，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约翰·费罗（John Filo）拍下了这个画面。此前，他因为有事出城数日，错过了抗议活动的高峰。听到枪响时，他正在摄影实验室里。然后，他迅速跑了出去，“我看到有个士兵用枪指着我，我说我要拍下这张照片，然后那人抓枪对旁边的树扫了一梭子，我决定不拍实弹现场了，保命要紧——天知道，天真与愚蠢怎么如此结合在了我身上。”费罗后来回忆说，“但跑开后，我又问自己，你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就开始拍照了。我知道自己不是活在电影中，我注意到那个女孩的情绪喷涌出来了。”照片在发表时的题目为：《14岁的玛丽安·维奇奥在朋友杰弗里·米勒的尸体旁哭泣》。

照片后来在多个媒体上发表，并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直到1995年，有人试图联系费罗调取原片时才发现，原片的中心、玛丽安的头上有一个栅栏。据推测，它是在杂志发表时，被一位匿名的编辑在暗房里修改了。因为发表过它的《生活》杂志以绝不篡改新闻照片著称，此事后来成为讨论新闻伦理的经典案例。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 Photographs Division

circa 1864: This print purports to be of General Ulysses S. Grant in front of his troops at City Point, Virginia,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Some very nice detective work by researche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revealed that this print is a composite of three separate prints:

- (1) the head in this photo is taken from a portrait of Grant;
- (2) the horse and body are those of Major General Alexander M. McCook;
- (3) the background is of Confederate prisoners captured at the battle of Fisher's Hill, VA.

1864年，由三张图片组合的美国内战时期在弗吉尼亚州珀特市的格兰特将军。

合成后的照片被视为是格兰特将军在美国内战期间，于弗吉尼亚据点的部队前留下的飒爽英姿。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发现，照片可以区分出三个独立的部分：(1) 人物的头部取自格兰特自己的照片；(2) 人物的身体和马，取自亚历山大·麦库德 (Alexander M. McCook) 的照片；(3) 背景取自弗吉尼亚州菲舍斯高地战斗中俘虏战俘的场面。

张大力 Zhang Dali 2010.10



1968年，卡斯特罗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战友法兰契站在正中间。后来古巴政府把他从照片上删除了。

法兰契在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负责《革命报》，使这个左翼的报纸在承担官方角色的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由于他经常对政府做出批评，与政权冲突渐多，最终，他被允许和家人离开古巴定居意大利，充当一个免费的古巴文化大使。1968年，他正式断绝了与古巴政府的关系，签署了一封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信。

在与古巴分手之后，法兰契也从古巴革命的宣传品中消失了。在得知这些后，法兰契写了一首打趣的诗：“我发现我的照片死亡了/我存在过吗？/我有点黑/我有点白/我是个坏蛋/在非德尔的背心。”



在这张著名的原图(左)中，1948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个军区总部的开幕式上叼着雪茄。但在最近一个为纪念战时领袖的博物馆展览中，这张相片的复制品挂在了大门口，而丘吉尔的雪茄却消失了。

一位名为大卫·麦克亚当的游客指出了这个问题，博物馆的经理约翰·威尔士承认之前一直没有发现雪茄不见了，他非常震惊，但他拒绝表示该由谁对此负责。

“我现在已经改变了‘只有极权主义暴君才会修改历史’这一看法。”大卫·麦克亚当说。



2009年底，八卦网站TMZ发布了一张表面裂纹斑斑的黑白照片，引发轰动。照片显示一个裸女伸展四肢跳入海里，另一个裸女一边爬上游艇，一边侧脸欣赏她的女伴。同时，游艇最上层的甲板还有两个女人在晒太阳，在她下面是一个长得酷似肯尼迪的男人，穿着白裤衩晒着舒服的日光浴。据介绍，该照片摄于1956年夏天的地中海，时为美国参议员的肯尼迪在那里度假。TMZ宣称，如果它在肯尼迪竞选总统之前被披露，那么肯尼迪的总统之路就会泡汤，美国历史就会被改变。

TMZ网站称，为了证实这张肯尼迪和四名裸女同游的照片的真实性，他们请了多名专家对这张黑白照片进行了鉴定，所有专家鉴定之后都断定这张照片是真实的。TMZ网站还另外邀请了两名肯尼迪传记作者来对这张照片进行鉴定，他们经过仔细检查后，也都相信这张肯尼迪和四名裸女游艇度假的照片是真实的。

但不久，《花花公子》杂志跳出来宣布这张“肯尼迪”的照片拍摄于1967年，当时肯尼迪早已去世。而且，照片发表于当年11月的《花花公子》上，并且还是彩照，是一篇名为《包租游艇派对：如何在海上和满船美女开舞会》的文章的附照。照片的拍摄者拉里·戴尔·戈登说，照片中的男女都是他请来的模特。

家很少。我跟艺术界除了有展览点点头以外，没有密切的接触，都认识，但平时不来往。我的圈子还是过去的几个老朋友。

中国现在有四种人 /

《LENS视觉》：2000年到2010年是你最重要的十年？

张大力：这十年很重要，是我的世界观的成熟期。这个过程很重要。随着岁数增长，知识量增长，还有在社会上跟各种人打交道，慢慢会形成观察社会的方式。这十年太重要了，使我变成了一个理性的艺术家，就是开始有工具去解构这个世界，而不是由着性子。一个人不可能凭着灵感出名。

《LENS视觉》：你的成熟也得益于你回到了变革中的中国？

张大力：中国实际上是由几部分人组成的，他们同时在这个空间里，造成了巨大的矛盾和冲击力。

中国存在着原始社会，有一部分人完全生活在原始社会，比如我们村子外面的人。有个小炉子，砍几棵树在那儿烧，为了烧热水，住的屋子家徒四壁，就一张床，什么都没有。第二部分，是农业社会的人，有一块地，可以种地也可以打工。我送朋友的时候在西客站看了好几次，西客站的电梯特别陡，特别大，有几个人背着包，一上电梯，就往后倒，因为他是从农业社会来的。第三部分是工业社会的人，工厂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电子时代的人，可以轻易赚到农民一辈子的钱。这四部分人同处一个空间，都在一

个时空买东西，等地铁，等车。

这种差异在中国能产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非常离奇，却是毋庸置疑的真实，现实比小说还真实。可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观察和把握度并不是很深，艺术家、文学家并没有写出这个伟大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我们太近了。

我刚听说一条新闻，毒贩以前把毒品塞到胃里运输，现在是找一些要做隆胸手术的女人去南方做手术。这些女人后来胸部化脓、发炎，毒贩再把她们请到一个地方去进行所谓的治疗。这样的案例发生了好几次，而且这些手术者都是亲戚朋友介绍给毒贩的。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人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小说都写不出来，但是确实发生了。

《LENS视觉》：社会的巨变让喜欢思考的人很兴奋？

张大力：对。但太兴奋了也不好，因为可能失去理性，会被感性的东西牵着跑。一个艺术家总归还是理性的，因为要把复杂的现象归纳，归纳到抽象的程度，然后进行创作。如果没有好的过程和反馈，凭着激动和感情，作品不会太好，不会有力量。

《LENS视觉》：你不是一个随性的人。

张大力：我做一件事情得想很长时间，但我一旦着手做了，就不会轻易结束，非得刨根究底做完。

艺术家有几个阶段，我们认为过去艺术家是凭灵感、凭感性，很随意地做作品，这是艺术家的一个阶段，电影小说里写的大都是这部分，但这只是成长的最基本阶段。

从感性进入理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你必然要进入到用大脑分析的时代，否则艺术会死亡。很多艺术家只是靠冲动来做作品，冲动是暂时的。

“人不过是碳水化合物” /

《LENS视觉》：看书的习惯是你上学的时候就有？

张大力：对。我上小学的时候，想当作家，不是画家，画画当时只是我的一个爱好。

《LENS视觉》：为什么放弃？

张大力：我们那个小城市根本看不到什么书，我看的书特别有限，除了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我能借到的就是《金光大道》《苦菜花》，也看了几本当时所谓的禁书，比如张恨水的《秋海棠》。所以后来我想要离开那个城市只有靠画画，因为我画得还不错。

《LENS视觉》：你跟外界沟通的方式是什么呢？

张大力：看电视、上网看新闻、读书、跟朋友聊天，就靠这几个手段获取信息。还有在城市走，用眼睛看。

《LENS视觉》：你每天都会工作？

张大力：对，我每天都为我做的事情思考，别的东西我不关心。我不知道别的艺术家是不是天天为他们的工作思考，但我是这样的。一般下午到工作室工作，处理文案，画画，晚上见朋友，夜里看书。



（下图）在2004年大选中，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的一张“老照片”引起关注。媒体的注释一般为：1970年9月，年轻时的克里坐在反战皇后简·方达的身旁，参加在宾夕法尼亚州瓦利堡举行的一个反战集会。

照片于2004年2月9日被公布在保守的“麦克斯新闻网”上，两天以后，《华盛顿时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张照片，这一次所用的标题是：《克里与简在一起的照片激怒越战老兵》。

克里实际参加过越战，而政治立场与之相近的简·方达也一直为他提供协助。方达说，当时克里就坐在她的身后，只隔几排之远，但他们并没有握手。她还指责共和党人试图诋毁克里的爱国主义，“任何将克里与我联系在一起、并利用这种联系使他避色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你怎能怀疑、甚至说，克里这样一个



越战老兵不爱国？他在那里是位英雄。”两人的照片合成自上面两张图片。

对于这场“照片事件”，方达认为，“这是现任政府制造的一个弥天大谎。我想，美国人民看腻了。我认为，它不会达到它的目的。”此外，这次大选中，还爆出了“方达和克里关系不寻常”的新闻。

Fonda Speaks To Vietnam Veterans At Anti-War Rally



Actress And Anti-War Activist Jane Fonda Speaks to a crowd of Vietnam Veterans as Activist and former Vietnam Vet John Kerry (LEFT) listens and prepares to speak next concerning the war in Vietnam (AP Photo)

设计师报了价，16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那时候啊。没想到李景汉答应了。我那天彻夜难眠，太高兴了，我有画册了。然后我在他那儿，1999年办了展览很轰动。接着有很多国外杂志来采访我，我的画开始能卖钱就从那次展览开始。

我觉得你的艺术在达到一个度的时候，必须找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可能是一个人欣赏你，可能是画廊，可能是你不知道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反正这个东西早晚会到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可以赚钱了，可以当职业艺术家了。2000年的时候，美国《新闻周刊》用了我的照片做封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当时，他们的老板在北京看了我的展览，给我做专访，他问我不能用故宫那张图片，结果他用那张照片做了杂志封面。那期杂志发行量特别大，很多人都要买这张照片，也给我带来了商业收入。

《LENS视觉》：你跟圆明园的那些人还有联系吗？

张大力：联系不多了，圆明园已经变成了另外一拨人了，我都不认识了。

《LENS视觉》：圆明园时期的艺术青年后来成名的多吗？

张大力：少。艺术就是这么一回事，几百年来都是这样，一大拨人参与，留下来的只是很少的几个。

《LENS视觉》：你跟艺术家的联系紧密吗？

张大力：不多，我认识的艺术

